

美术学博士文丛



赫赫明后栗
克君牧守三
詠歌麟旒瑞
儗威植恩竝
饌山浚瀆路
之迹亦世賴

漢心映頌壬子春日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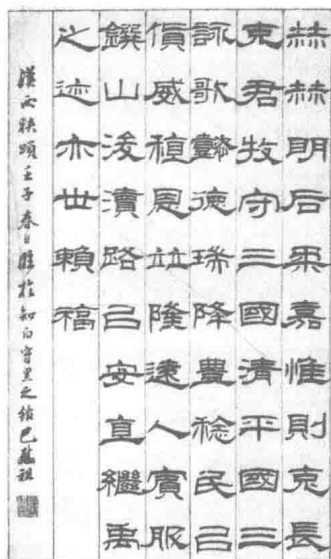
李洁冰 著

明清徽州

书法文化研究



天津出版传媒
天津人民美術



美术学博士文丛

明清徽州 书法文化研究

李洁冰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徽州书法文化研究 / 李洁冰著. —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12

(美术学博士文丛)

ISBN 978-7-5305-6967-2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安徽省—明清时代 IV. ①J292.1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7947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58352900

出版人:李毅峰

网址:<http://www.tjrm.cn>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3

印数:1-15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38.00元

《明清徽州书法文化研究》摘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时期，产生了诸如明初官方推重台阁体、中期吴门书派大兴、个性解放潮流折射书坛、清初董氏书风继续一统天下、金石学兴起、碑学兴盛、众多书印俱佳的书家崛起等独特的书法现象，徽州书法发展轨迹中的主要特征恰恰能与此相佐证。明清时期徽州书法在徽州文化繁盛的背景之下，亦呈现出兴盛局面，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名家辈出，全面参与到整个明清书法发展进程中。明清书法史中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徽籍书家的参与，比如明清台阁体书家詹希元，身兼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草书大家、鉴藏家及新安画派早期代表等多重身份的书家詹景凤，书画兼宗、于明末清初影响巨大的书家查士标，金石学书家程瑶田以及书印俱佳、同时又是徽州篆刻代表人物的巴慰祖等；甚至某些书法现象就发端于徽州，继而辐射全国，比如徽派篆刻从产生、发展至鼎盛的过程中，诞生了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考究文字之源，兼擅篆隶，书印俱佳，影响了整个中国篆刻史乃至书法史，为徽州书法增添了浓重而独特的色彩；另外，徽州书法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如徽州工匠这一特殊群体，尤其是制墨、刻书、版画、制砚等刻工，其精湛的工艺也源于良好的书法修养，并且有的本身就是书法高手。

第二，明清儒商经济渗透到徽州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书法文化领域。徽商资本介入书法艺术的资助、收藏，使得书法由宫廷、书斋中又下移至民间，走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徽州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贾而好儒”的徽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代书画，徽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之海”。商业的发展以及“贾而好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本以文人文化生活为主要动因的书法活动模式，书法与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发生了越来越深入的关联，其社会性得到了扩展。

其三，徽州刻书、刻帖及文房四宝产业创造出瞩目成就，使书法具有了商品化特征。书法与它们互为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商品流通领域，成为徽州文化发达的表现之一。徽州是“文房四宝”的温暖摇篮，徽州文化直接促进书写材料和用具的长足发展，这也是明清徽州书法的重要特征。

总之，明清徽州书法既是徽州文化濡染的结果，也是徽州文化繁荣的表现，同时还是明清书法发展状况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

关键词：明清 徽州 书法文化 徽商

目 录

绪 论

.....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现状.....	4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8
四 选题意义和价值.....	9

第一章

明清徽州书法兴盛的文化地理环境.....	11
第一节 古老的历史地域.....	12
一 徽州历史沿革.....	12
二 徽州地理人文环境.....	14
第二节 徽商的特殊文化品格.....	17
一 徽商的形成与发展.....	17
二 “贾而好儒”.....	18
本章小结	25

第二章

明清徽州书法.....	26
第一节 徽州代表书家.....	26
一 詹希元：明初“台阁体”先导.....	27
二 詹景凤：明中期草书大家、鉴藏巨擘.....	35
三 查士标：书画兼宗的大家.....	42
四 程瑶田：乾嘉大儒与金石学书家.....	53
五 巴慰祖：书印俱佳的书家代表.....	63
六 明清徽州书家群体分析.....	66
第二节 徽派篆刻.....	76
一 何震与徽派篆刻兴起.....	76
二 明末至清中期徽派篆刻的发展.....	89
三 晚清徽派篆刻的后劲.....	99
第三节 徽州与外埠书法互动.....	101
一 徽、苏、扬书法的互动与交流.....	102

目 录

第三章

二 “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	106
本章小结	110
明清时期徽州的书画市场和收藏	111
第一节 明清徽州地区书画市场的繁荣	111
一 书画市场繁荣的背景条件及表现	111
二 徽商对书画艺术的资助	122
第二节 明清徽州的书画收藏家	125
一 歙县吴氏收藏	126
二 徽州其他书画收藏家	133
本章小结	138

第四章

明清徽州刻书、刻帖、书写工具与书法	139
第一节 徽州刻书与书法	139
一 徽州刻书的形成和发展	140
二 徽州刻工与书法	146
三 徽州刻书字体——宋体与书法	149
第二节 徽州刻帖	154
第三节 徽州书写工具与书法	157
一 徽墨从来举世尊	158
二 徽笔：“尖、圆、齐、健”具四德	167
三 徽纸：百金不许市一枚	168
四 龙尾歙砚天下冠	171
本章小结	175

结 语

.....	177
-------	-----

参考书目

.....	179
-------	-----

附 录

.....	184
-------	-----

*1. 文献载明清徽州书家相关资料	184
-------------------------	-----

*2. 《书画记》录吴其贞书法藏品统计	197
---------------------------	-----

后 记

.....	200
-------	-----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典型意义上的徽州文化是指北宋宣和三年(1121)徽州府设立以后直至民国时期,在当年徽州府所辖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域发生与存在,以及由此辐射、影响全国的典型封建民间文化。徽州文化伴随着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而崛起,随时代的进步而走向繁荣,并连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消亡而衰落。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印刷出版、医药卫生、体育竞技、方言俚语、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领域,以及在社会关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传统工艺等物质文化领域,都有着非凡的创造和突出表现。徽州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创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了有着自己风格与特点的流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¹这就是说,艺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地域文化有内在的联系。地域文化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造就的,是文化传承的集中体现。王元军先生在《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中写道:“通览魏晋南北朝正史与碑志等书迹资料,书法与地域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文化繁盛之地往往是书法风气特盛之所。”²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域可以塑造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一定地域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书法产生影响,就形成了书法的地域差异。在中国书法史上,这种地域书法现象一直存在,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关于南北书风之别的理论,明末清初即开始孕育。冯班在《钝吟书要》中发扬了明代董其昌关于画有南北宗之说,认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³。钱泳的《履园丛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⁴在中国历史上,东晋、南北朝时期因地域之分而形成文化色彩的差异,是最为明显不过的。清代的朴学家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正书、行书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⁵这主

1 [法]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2 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3 [明] 冯班,《钝吟书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52页。

4 [清] 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20页。

5 [清] 阮元,《南北书派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30页。

明清徽州书法文化研究

2

要是以我们国家所处地域来区分南北书派的。具体地说：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¹

阮元南北书派论之说虽然尚存争议，然而其指出书法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论断是可取的。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还以南北书法之别作为重要论据。他这样写道：

“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道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等为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²

明清书法史上，明代的“吴门四家”和清代的“扬州八怪”，也是具有典型性的地域书法群体。

已故学者汪世清先生说：“歙县书法家，也很值得作专门研究。其实新安画派的特色之一，便是书画的相得益彰，可惜研究新安画派的专家却很少注意及此。”

徽州历来有重教重学的传统，这为书法的全面普及提供了可能。宋代罗愿《新安志》提出：“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³，徽州不断有名臣涌现。文人多，名臣兴，意味着知识阶层的扩大，徽州书法也由此而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⁴，明清两代，徽州是科举和入朝人数在全国

1 [清]阮元，《南北书派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30页。

2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1页。

3 [宋]罗愿纂，赵不悔修，《新安志·卷一·风俗》，宋淳熙二年（1175）修，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604页。

4 语出元末赵汭的《商山书院学田记》。宋元以后，徽州成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有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除设府学、县学和书院外，还设立了大量的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各族还设有族学，免费为族内贫寒子弟提供教育。重视教育，蔚然成风。“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正是当时徽州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

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区域，涌现出诸如“同胞翰林”¹“父子尚书”²“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³等科举佳话。因此，朝廷重臣，或封疆大吏，或知县知府，有很多擅长书法者。再者，徽州学者这一群体本也颇擅书法，然而却不屑以书法闻名，书名常为学问所掩，如坚持在自己名字前加上“新安”或“紫阳”的朱熹本也对书法有所造诣，只不过因为他的学问名气大，书法之名为其所掩。

徽州民间有可观的书家群。明嘉靖年间，歙县方元焕（字两江）以擅书而“名重朝野”，当时有谚“家无两江字，不是大人家”，即是说谁家要是没有方两江的字，那就不是大户人家。一次方氏进京赶考，当朝宰相严嵩“许以高第”，只是希望得到他的书写屏文，方氏“称疾而返”，“人高其节”。⁴又，明万历时，歙人罗文瑞“工书，万历二年（1574）所书医无闾碑，结法自真卿、公权”，此碑王世贞为跋，一时声溢全国，时“燕赵齐鲁碑碣，多出其手”。⁵又据民国《歙县志》记载：

“方辅，字君任，号密庵，岩镇人。工书，入颜平原之室而参以苏、

1 清康熙年间，徽州歙县唐模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二人俱考中进士。一授庶吉士，一授编修，均属翰林院，故有“同胞翰林”之说。许承宣，字力臣，康熙三年（166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给事中。典试陕西，察民疾苦，上六疏，语中利害，直声大著。著有《宿影亭集》《青岑稿》《西北水利议》；许承家，字师六，号来庵，承宣弟，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有《猎微阁诗文集》。唐模村头至今仍矗立着“同胞翰林”牌坊。

2 指歙县雄村人曹文植、曹振鏞父子。曹文植（1735—1798），字近薇，号竹虚。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传胪，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授左副都御史，擢户部尚书。为《四库全书》总裁，又充三通馆副总裁兼同办。后因和坤擅权，不愿阿谀逢迎，以母老乞休。卒谥文敏。曹振鏞（1755—1835），字俪笙，号怪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二年（1787）授编修。嘉庆年间历任学正、工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元年（1821）拜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并在北京内城受赐府第。道光七年（1827）因襄赞军务有功，加衔太傅。卒谥文正。曹氏父子科举入仕，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故有“父子尚书”之称。

3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状元黄轩是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状元金榜是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状元吴锡龄又是休宁人。接连三科状元俱为徽州儒生所得，颇不寻常。同治十年（1871）梁耀枢榜洪饴、郑成章、黄家惺、汪运轮四人同科考中进士，俱授庶吉士。四人皆属歙县西乡人，他们的家乡岩镇、郑村、潭渡、西溪南四村镇都在丰乐河畔，相距仅十余里。如此相近的同乡四人同榜高中，俱归翰林，诚为罕见。遂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科举佳话流传。

4 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方技》，《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志辑5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5 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方技》，《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志辑5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米。尝游汉皋，作‘大别山’三字，方九尺有余，沉着飞翥。”¹

明清时期，“贾而好儒”的徽商在文化事业，尤其是书画艺术品市场中的投资和消费巨大。徽州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催生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市场，至明末及清初较为成熟。徽州地区的书画收藏、书画交易非常繁荣、发达。吴其贞《书画记》对于徽州地区收藏和交易情形记载颇详细：

“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²

综上，加之徽州闻名于天下的刻书与文房四宝产业的发达，就大致可以看出徽州书法渊薮。徽州文化丰富和广阔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它不仅具有徽学自身的研究价值，在多学科领域，也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其中对明清徽州书法的研究，就是一个可以进行的课题。徽学研究之盛，唯独对徽州书法还缺少关注，对其系统整理、爬梳尚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二 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二十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契约陆续被发现，包括契约字据、公文案牒、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书稿等等，内容广泛。加之有3000种徽州典籍文献和一千余种族谱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徽州学勃然兴起。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三大地方显学之一，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成果，推动了明清史学研究的发展。

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国内有下列四个徽学研

1 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方技》，《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志辑5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

2 [清]吴其贞，《书画记》卷二《黄山谷行草残缺诗一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中心（北京），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芜湖），安徽大学徽州学研究所（合肥），黄山师专徽州文化研究所（屯溪），以这些研究机构为中心，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这里不一一列举。近二十年来，徽学研究著述颇丰，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方向已经比较全面，但多集中于与之相关的专业，比如徽商、宗族制度、徽州教育、刻书等，对徽州地域书法整体、系统的研究还为数甚少。

徽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宋元时期徽州的志书和族谱，南宋歙县呈坎人罗愿撰写的《新安志》¹，是一部记载新安郡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也是早期徽学研究之作。明代休宁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²，是第一次辑录徽州原始文献的总汇。徽州地区历代重视编修方志和宗谱，典籍文献非常丰富。徽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是清末民初歙县许承尧的《歙事闲谭》³，是徽州地区历史文化史料长编，为徽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对徽州书家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有学者关注，如宗典《詹景凤及其美学思想——〈东图玄览编〉〈詹氏书画旨〉校后记》，1985年载《徽州学丛刊》创刊号；翟屯建《程瑶田与金石考古》，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但总体来说，对徽州文人书家的系统研究仍有很大空缺，而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关于徽派篆刻，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如是评价：

“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数见不鲜，为世厌弃。……黄山和穆倩（程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⁴

1 罗愿（1136—1184），字端良，号存斋，歙县人，荫补承务郎。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历任鄱阳知县、赣州通判、鄂州知事。《宋史》记载“博学好古。法秦汉为词章，高雅精练。有《小集》卷、《尔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绩。”所编著的《新安志》是现存徽州乃至安徽唯一的宋代志书，历史价值很高。

2 程敏政（1444—1499），字克勤，明徽州休宁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少时才思敏捷，名重于世，时在朝翰林中，以学问渊博著称。著有《宋遗民录》《篁墩集》，编有《明文衡》《新安文献志》《休宁志》。

3 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号疑庵，晚署范公，歙县唐模人。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史学家、教育家。1905年，他首先在徽州府城（歙县）创办新安中学堂，附设师范科；第二年创办了紫阳师范学堂，标志着徽州师范即安徽省第一所中等师范的诞生。他亲任两校监督，聘请革命志士同盟会会员黄宾虹、陈去病等为教习（教员）。他还协助其祖父许品三公在家乡唐模，创办了私立敬宗小学和瑞则女子小学。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多层面揭开了徽歙新教育的序幕。主持编撰百万字的民国《歙县志》，还出版有《疑庵诗集十四卷》。他编撰的《歙事闲谭》被称为古徽州文献志的里程碑。

4 [明]周亮工，《印人传》卷一《书沙门印寿印谱前》，[清]顾湘辑《篆刻丛书》上册，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

黄易在《印款》中对程邃评价甚高。黄宾虹对歙派篆刻有所创新，编有《宾虹草堂藏印》。叶为铭，祖籍徽州，故署款、印章恒冠新安。精篆刻，尤擅刻石拓碑。光绪三十年（1904）与丁辅之、王福庵、吴潜泉等在西湖孤山，创设“西泠印社”，为从事印者研究及保存古金石之所，影响及于海外，并著有《列仙印玩》《广印人传》《金石家传略》《叶氏印谱存目》《歙县金石志》《叶氏手抚周秦玺印谱》等。

徽派篆刻的地位和影响，散见于今人各种篆刻著作，如沙孟海先生《印学史》，刘江先生《中国篆刻学》《中国印章艺术史》等著录中都有专门章节叙述。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也很多，如翟屯建著《徽派篆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黄惇主编的《清代徽宗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但是书中关于“徽派”“皖派”的划分颇受争议。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人。著有《太函集》¹一百二十卷，存明刻本。本书是徽商研究和明代经济史研究的力著，有关于徽商收藏家的记录也为数不少，史料价值甚高。另外，汪砢玉《珊瑚网》²、吴其贞《书画记》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著作也真实地记录了江南地区艺术市场的书画流散情况，为徽州书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陈智超先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

1 《四库总目提要》载：《太函集》明汪道昆撰。道昆有《五车霏玉》，已著录。是编刻于万历辛卯，凡文一百六卷，诗十四卷，卷首有《自序》及目录六卷。道昆名在后五子中，最高自标置，丹阳姜宝以翰林出提学四川，道经楚省，三人会饮于黄鹤楼。伯玉举杯大言曰：“蜀人如苏轼者，文章一字不通，当以劣等处之。”众皆愕眙云云。其狂诞殊甚，然文章实皆伪体。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云：“王、李初起，道昆尚未得与其列，后以张居正心膂骤贵，其副墨行世，暴得时名，世贞力引之，世遂称元美、伯玉。汪文刻意摹古，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世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子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子心排太函之文，而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云云。其论颇为切中。德符又称张居正父七十，世贞、道昆俱有幃词，世贞刻集中。六七年居正败，遂削去。道昆垂歿自刻全集，在居正身后十年，而全载此文，不窜去一字，稍存雅道。云云。今按：《封柱国少师张公七十寿序》一首，见此集第十二卷中，则德符之言为信。然以居正父为众父父，至比之于苍苍之不言，究不可以为训也。今有单行本《太函集》，胡益民、余国庆点校，黄山书社，2004年。

2 中国明代书画著录著作。汪砢玉著。汪砢玉，字玉水，号乐卿，秀水（今属嘉兴）人，曾官山东盐运使判官，能诗文，擅书画，家富收藏，另著有《古今薮略》等。《珊瑚网》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全书四十八卷，分两大部分：前二十四卷为古今法书题跋，包括钟繇以后的法书名迹、款识、碑帖石刻、丛帖及《书凭》《书旨》《书品》等；后二十四卷为顾恺之《洛神赋图》以后的古今名画著录及《画据》《画继》《画法》等；同时录编各家书画史、论有关部分，但对其真伪缺乏考证。

释》¹一书是对徽学研究的重大著作，手札收藏者方用彬在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歙县文坛艺苑曾名著一时。这批手札反映了方用彬与诸位亲友及各方名士在银钱借贷、以物当银、文物交易等经济方面的往来和在诗、书、画、篆刻等文化领域的交流，对研究明代书法、篆刻艺术有重要的价值。上述文献资料中有关徽州书家及书法活动的记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关于徽州刻书研究，亦不乏详细论著，如陈雪云《明代官府的刻书》，《档案管理》2003年第4期；李咏梅《试论明代私人刻书业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2期；李忠林《徽州刻书业论略》，《晋图学刊》2004年第5期；吴萍莉《晚明南京的徽籍刻书家》，《晋图学刊》2001年第4期；严佐之《论明代徽州刻书》，《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郑玲《徽州刻书研究述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年第5期；潘天祯《胡正言家世考》，《国家图书馆学刊》1994年；《胡正言生卒、定居及启用十竹斋名的时间考察》，《国家图书馆学刊》1995年；李国庆《徽州仇姓刻工刻书考录》，《江淮论坛》1992年第5期；翟屯建《虬村黄氏刻工考述》，《1995年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刘尚恒《明清徽商的藏书与刻书》，《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等。

然而，以上论著多从刻书与徽商经济角度发掘，正如钱泳在《履园丛话·十二·艺能》中所强调的：

“刻手不可不知书法。”

“如其人不能书，胸无成见，则又恐其依样葫芦，形同木偶，是与石工木匠雕刻花纹何异哉？”²

书法艺术与刻书、刻工也是有着相当的联系的，本文在利用诸多现有的宝贵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以此为视点，加以论证。

徽州的文房四宝，自古便是文人的珍藏之物，历来对其吟咏、喜爱的

1 陈智超著，考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共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20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目前已知的数量最大的明人信札。且收信人为方用彬（1542—1608），字元素，歙人。家本富饶，入赘为国学生，曾师事汪道昆，具有较深文化素养，同时开设店铺经营古文化产业和典当业，生平好游，多结交四方名士。

2 [清]钱泳，《履园丛话·艺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983年影印，第317页。

记录不胜枚举，今人对其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周玄《曹素功制墨考》，《安徽史学》1958年04期，记安徽歙县曹素功家制墨，从清初起连绵不断，跨三百年左右；周珏良《中国古墨述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04期，记明清两代制墨工艺较前代发达，名家辈出，实物流传亦较多。有关婺源墨工制墨的情况，是研究徽州造墨史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陈爱中《清代婺源墨工简述》，载《黄山学院学报》1999年03期，对此有所深研；对胡开文的个案研究比较深入，如陈希《胡开文墨业史略》（上）（中）（下），连载于《徽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3期；黄秀英、汪庆元《胡开文墨业考》，载《东南文化》2003年09期，此文以新近公布的墨品实物和文献资料对胡开文墨业的开创、发展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徽墨”将和中国书画艺术一起流芳百世的趋势；鲍杰《安徽屯溪胡开文墨店史记》，《江淮文史》，1999年02期；老卉《〈歙砚辑考〉及其他》，《安徽文博》1980年第10（1）期；陈学义《古代徽州纸砚墨手工业的发展》，《徽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徐子超《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江淮论坛》1992年第6期；晓希《中国墨模的制作及其艺术价值》，《安徽文博》1980年第10期。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本文从地域文化入手来探讨徽州书法。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它的存在是客观的，其中种种文化类型的表现特点也是客观存在的。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相对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在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地域特点，具体到属于徽州地域文化的徽州书法，则与当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活动紧密相连。徽商积极参与书法活动，书法与当地的篆刻及刻书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地域书法集中现象和与众不同的特点。

其二，本文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入手来研究徽州地区的书法。区域经济决定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区域经济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从历史上来看，区域经济对地域文化的决定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徽州地区在宗族制度影响下，重视文化教育，学风浓厚，朴学发达，随着商品经济兴盛，当地的文化也发展到新的高度。书画鉴定和收藏等书画市场的活跃，士商互动的加强，使得书法家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加频繁；刻书业的兴盛，刺激了刻帖的发展；同时，与书法相关的手工

业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些都呈现出徽州地域独特的书法文化特点。

其三，本文从地域文化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入手来研究徽州书法。地域文化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水准较高的话，它也常常受到比它更高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的。所谓联系就是地域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融合。徽州与当时周边的苏州、扬州等联系紧密，书法的发展亦与它们联系紧密，徽州地区的黄山积聚了一批文人书画家，形成了风格统一、影响较大的黄山画派；王世贞、董其昌等都与徽州书家有着密切往来，对徽州书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出土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佐证的治学方法。通过文献探讨提出值得研究的课题，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上界定自己欲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分析问题、理论推导以及创新的基础。随着考古等学科的发展，大量实物资料不断出土，如徽州文书、谱牒等，本文综合利用正史、笔记小说和碑刻、墓志等资料，从较为宏观和整体的角度考察徽州书法发展、书法活动的具体状况，力图将其置于明末清初书法发展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结合图版，窥其全貌，从而获得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第二，史论结合法。通过对实物资料的考察、梳理、归纳，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对其进行论述总结。

第三，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本文研究过程中，把明清徽州书法回归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论述其生成的文化机制、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等。

第四，分析比较法。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件、人物、思潮和学派等，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对照，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共同规律或特殊规律。本文不以徽州作为孤立范本，也试图以其与苏州、扬州等地区的联系互动为视角加以比较研究，使徽州书法文化发展的面貌更丰富和真实。

四 选题意义和价值

就传统书史研究而言，往往尊奉庙堂书法，推崇名家书迹。本文选题意义所在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本论文的写作以整体性的眼光对明清时期徽州书法发展状况进行客观探讨，勾勒出中国古代书法史中一个横切面的轮廓，从而揭示整个明清书法史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其次，本文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试图有所推进，如徽州书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所体现出来的商业化现象等等；第三，本文尝试借鉴版本学、文献学相关理论来审视徽州书法的有关问题。

由于占有相对丰富的文献、图片资料，在相关问题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比如，对于徽商与文人的交游以及资助文人书画家的动因，研究者们更多地认为主要取决于其附庸风雅和以儒行促贾业两方面因素，但笔者在考察相关文献资料后认为，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儒商性质使徽商更多抱以修身励志、放松身心、娱乐自我的目的参与到其中，从而排除了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徽商赞助文化艺术活动绝对功利性动因的曲解。

第一章 明清徽州书法兴盛的文化地理环境

徽州处皖、浙、赣三省结合部，古又称“新安”，本文中在概述地域过程中所使用的“新安”与“徽州”具有相同的内涵。在这里孕育出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或称“徽州文化”，当代学界以之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徽学”。作为地域文化的徽学，其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州商帮、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墨、徽砚、徽笔、徽纸等。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社会文化的繁荣，徽州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之区。

徽州文化影响深远，举其类如商业经营上有著名的徽商；哲学上有新安理学，亦即朱子之学，其开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婺源的程洵，休宁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源远流长；考据学上有徽派朴学亦即江戴朴学（江永，婺源人；戴震，屯溪人），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影响极大；绘画上有新安画派，歙县江韬（即浙江）被认为是其祖师，近代有歙人黄宾虹等；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兴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物是何震、黄士陵等；刻书有徽派刻书，它始于南宋，兴于明清，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人有刻，必求歙工”，¹徽刻俨然与常（州）刻、苏（州）刻齐名为当时全国三大刻书；版画上有徽派版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明代万历年间有“无剧不图”，“刻图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黄氏”之说。据统计，从明正统元年（1436）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约四百年时间里，徽州黄姓以刻书为业者就达三四百人；²戏曲上有徽剧，它是京剧的前身，清乾隆年间，曾出现“四大徽班进京”，名噪一时；建筑上有徽派建筑，为中国建筑史上一绝；医学上，有极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棋艺上，新安围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辈出，明清时围棋界的新安派被誉为与“永嘉派”和“京师派”齐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县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贞在《弈旨》一书中列为四个“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县人程兰如则被称为与范

1 嘉靖《徽州府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 周亮，《徽派版画史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